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战争

(1911 年 10 月—1912 年 4 月)

1911 年（清宣统三年）10 月 10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发动了一场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战争。这是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又一个新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在这次革命战争过程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本章对这方面的内容仅作概要的介绍，而着重叙述武昌起义，汉口、汉阳保卫战，攻取南京城等作战行动，并针对这次起义战争的特点，探讨其在指导方面的得失。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阴谋，由于受到中国爱国军民的打击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扶植清廷，“以华治华”的策略。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对中国的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派遣了顾问，以左右清廷的重大决策；在京津、京榆沿线驻扎军队，以武力挟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内河航运等特权。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在十六个城市内设有租界，霸占了十几个省的矿产开发权，取得了粤汉、正太、津浦、陇海等十多条铁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通过增设银行，扩大资本输出，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在掠夺中国时，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屠戮和凌辱。俄国战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乘机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经过肮脏的交易，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清政府听任帝国主义驱使，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随着清政府卖国残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块实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发布“变法”上谕以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裁撤冗衙、节省浮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视的是练兵。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①为会办练兵大臣。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和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陆军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协设统领，每协辖两标。标设统

^①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1895年12月被推荐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袁即怀着建立私人军队的野心，结党营私。清政府推行“新政”时，袁抓住“练兵筹饷”这项要政，进一步培植私人势力。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清廷任命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实授）。袁到任后，积极筹饷练兵，建立北洋常备军。至1905年，先后编成以“小站旧人”为骨干的北洋新军六镇，共计七八万人。袁世凯以此为资本，左右朝政，并成为与革命为敌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头子。

带，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镇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将弁兵夫共一万二千人。遇有征调，则以二至三镇为一军，由朝廷钦派总统节制。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除近畿四镇、四川三镇外，其余各省编练一至二镇，限二至五年内编成。新军的编练工作，大多数省份没有按期编成。直至 1911 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四镇，其余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总人数约二十六万人。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还把部分绿营练勇等改编为巡防营，以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虽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却同时又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饷款，而当时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摊派勒索，无奇不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 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①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 年 2 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 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① 华兴会于 1904 年 2 月在湖南长沙成立，主要负责人有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黄兴任会长。

1895 年与 1900 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于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 1906 年起，各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 1906 年 12 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 年 5 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 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 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 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 年 3 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 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

^于 1904 年冬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蔡元培、龚宝铨、陶成章等，蔡元培为会长。

^习 所于 1904 年 6 月在湖北武昌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胡瑛、吕大森、张难先等。

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 1908 年 11 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 年 2 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 年 4 月 27 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①。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成立于 1911 年初，由蒋翊武^①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 1907 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 年 10 月，孙武、焦达峰^②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 1910 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

^①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廪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县人。十五岁考入长沙岳麓书院，后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1902 年被选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他在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界的抗俄、排满革命活动，并在课余悉心学习军略，参观兵操，练习骑马射击。1903 年回长沙任教。1904 年组织华兴会，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在长沙举行起义，因事泄失败。起义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次年，结识了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被推为庶务，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黄兴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② 这是一次由同盟会策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举行的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1906 年，同盟会总部派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湖南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刘在长沙主持全局，蔡往萍乡策动哥老会首领龚春台，联络各地山堂，成立“洪江会”。拟于 1906 年旧历腊月底分三路起义。后因事泄，清军突袭浏阳麻石起义机关。12 月初，龚春台在江西萍乡高家台率众起义。萍乡、醴陵、浏阳等地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军队纷起响应，推举龚春台为都督。旬日之内，起义武装发展至三万余人，屡败清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南京军队数万人进行镇压。起义武装因各自为战，至月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等被捕牺牲。

^③ 起义前，黄兴等计划以新军为主干，以革命党人组成的“选锋队”为中坚力量，并发动广州附近的农民配合，分兵十路进攻广州。后因内奸告密，广州全城加强了戒备。在实力尚未集中又不得不发的情况下，黄兴等率“选锋队”百余人单独行动。结果起义失败。这次起义殉难的七十二人葬于黄花岗，故称黄花岗起义。

①，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①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1）}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②。湖北革命党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

① 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县人。1905年在上海创办《竞业旬报》，鼓吹民族主义。1909年投身湖北新军，次年参加振武学社。1911年，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任社长。

② 孙武（1879—1939），湖北汉口人。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员、管带等职。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赴日本学习海军。1907年在日本参与组织共进会。1909年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

^{（1）} 1886—1911），湖南浏阳人。1904年加入哥老会，倾向革命。1906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次年与孙武等在东京成立共进会。1909年回国，建立湖北共进会，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下同），第55页。

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 1906 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 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谕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 年 5 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 1911 年 5 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革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第二节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潮 (1911年10月—12月)

一、清军在武汉的部署和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兵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①。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阳。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 and 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澂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年9月上旬，瑞澂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②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③，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澂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123页。

^②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五册，第9页。

^③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页。

的骨干联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阴历中秋节）

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阳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澂召集首县^①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阳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①等研

^① 湖北旧军有巡防营、水师营、八旗兵和绿营兵。巡防营分五路（武汉、黄冈、襄阳、宜昌、安陆）驻防，每路五营，每营二百五十人，共约六千二百余人。水师营驻汉阳、黄冈、襄阳、宜昌、安陆。荆州驻有八旗兵九千余人。各地还有未裁绿营兵七千余人。

^① 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911年7月由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专■经营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并以两湖为活动

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②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义，光复武汉三镇（参见附图二十三）

（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澂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澂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①愚蠢的瑞澂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一万余支，单筒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

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

中心。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46页。

^① 首县即督抚衙门所在县。

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辘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辘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混成协辘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枪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澂、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辘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辘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场、紫阳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 10 点 30 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阳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 12 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阳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阳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往“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①。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 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三）夺占汉阳、汉口

10 月 11 日下午，驻汉阳的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左队驻兵工厂，前队驻钢药厂）的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后，决定于当晚 8 时 30 分举义，并派人与驻汉口居仁门的第二营取得联络。汉阳的起义者未遭任何

^① 刘复基（1884—1911），湖南常德人。字尧激。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 年回国后，在长沙、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09 年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1911 年初，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积极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9 月，任起义领导机关的参议。

抵抗，迅速占领了兵工、钢药两厂^①，并拖炮布防于龟山。起义军随即向从武昌逃来的辎重第八营（宿于大校场）三百余人发起攻击。该部未作抵抗，即向汉口刘家庙方向逃窜。12日清晨，瑞澂派载有步兵的军舰一艘，从刘家庙直驶龟山，企图夺占兵工厂，结果被龟山上的炮兵发炮击中，被迫驶回青山下游。同日上午，驻汉口的第二营中的革命党人，在第一营派人策应下，亦率众起义，并拟夺占刘家庙车站。该营在进军途中，得知清河南援军已抵汉口郊外，因虑寡不敌众，遂退回大智门一带防守。驻汉口的三十标第二营中的旗兵，大部闻风逃匿，其余百余人与二营的起义者一起，分防汉口，维持社会秩序。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起义军严守纪律，“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②，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也积极支援革命军，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四）湖北各地遍燃革命烽火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10月12日，梁钟汉、王守愚在汉川起事，杀死县令，组织军政分府。15日，刘英在京山永隆河起兵，很快攻克了钟祥、天门、潜江、监利等地。17日，武汉下游重地黄州（今黄冈）宣布独立，所属八县一齐响应。与此同时，驻守河南信阳的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党人刘化欧等率领起义士兵、工人、农民、会党千余人进袭武胜关（不久即被清军击退）。19日，唐牺支组织革命军攻克武汉上游重镇宜昌，先后夺取当阳、沙市、荆州等地。28日，施南驻军反正。11月下旬，郧阳、襄阳等地，亦被会党势力与起义的新军所控制。这些起义，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

三、成立军政府，编组革命军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起义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重要领导人又迟迟不来武汉。而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孙武负伤，蒋翊武脱险离汉，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缺少有威望的人物，加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于10月11日上午成立军政府时，竟将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③抬出来做了都督。其理由

^① 1884—1911），湖北鄂城人。1904年入湖北新军，次年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入宪兵学校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11年初，先后参加文学社与共进会。9月，任起义领导机关军事筹备员。

^② 1886—1911），湖北襄阳（一说谷城）人。1911年初加入文学社。9月，任起义领导机关交通，负责运送军火。

^③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同），第55页。

是可以利用黎的“威望”以“号召天下”。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等也乘机混入了军政府。军政府内部成员复杂，从成立第一天起，革命势力与旧势力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了行使领导权，便由蔡济民等十五人组成谋略处^①，实际负起领导责任。10月12日，复由革命党人詹大悲等组成汉口军政分府。

军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如下工作：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民众，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号召各省人民迅速执竿起义；致电黄兴、宋教仁等，促其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颁布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法令；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告以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要求外国政府不得助清“以妨害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为了保卫武汉和推进革命，10月14日，军政府决定扩编革命军，在参加起义的三千人基础上，扩编成步兵四个协、骑兵一个标、炮兵二个标、工程和辎重各一个营。自军政府贴出招兵布告后，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退伍士兵踊跃参军，四五天内即招足了约二万人的新兵，而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

不绝。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骑兵、炮兵各一个标，工程、辎重各一个营，机关枪一队，以及将校决死团、学生军、宪兵队等。此外，还集中部分老兵组织了四个敢死队，并编组了荆襄、长江水师。总兵力最高额约六万人。

革命军的编制仍仿旧军队，军官的薪饷则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支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样，士兵的生活有所提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有改善。由于编制扩大，新兵数量骤增，军事干部极感缺乏，大部分老兵被提升为初级指挥官和军士。因战事紧迫，部队训练不多，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

军政府在扩军的同时，还部署了武汉三镇的防务：吴兆麟的步兵第一协防守汉阳；何锡藩的第二协防守汉口；成炳荣的第三协防守武昌武胜门外两望山至青山一带；张廷辅的第四协防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协（10月16日成立）为预备队，驻武昌。马、炮各标营分隶各协指挥。

武昌起义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武汉三镇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此兴办企业，开辟航运，倾销洋货，不仅工人受到剥削，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

^①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广总督瑞澂致内阁军谕府陆军部请代奏电》，《辛亥革命》（五），第289—290页。

工人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加上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不惜耗费巨额资金，在湖北积极推行“新政”，因而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捐税分外苛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这就为首义成功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党人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新军中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积蓄了相当的革命力量，从而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也是很成功的。起义的部队首先抢占制高点和军械库，并由基层单位迅速推举出统一指挥的人员，立即组织部队实行步炮协同，很快攻占敌人的首脑机关，使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从而很快控制了武昌城。

四、各省响应起义，纷纷宣告独立

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首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和会党攻入长沙。巡抚余诚格外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胜利后，军政府下令扩军，并先后派王隆中、甘兴典各率步兵一协赶赴湖北，支援武汉革命军，使首义地区增强了抗清实力，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日，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占领省城西安。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管带张凤翔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湖口及马当炮台，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0日，南昌新军举义，占领南昌城，建立江西军政府。

接着，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的省市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其中以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和下游的江苏、安徽对武汉影响较大。北方地区各省，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为稳固，因而没有出现独立的省区，但当地的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和暴动。此外，东北、内蒙、西北的甘肃和新疆、西南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先后爆发了反清斗争。这些起义和暴动，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策应作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同盟会对迅猛到来的革命形势没有足够的准备，缺乏坚强的领导和通盘的筹划，在各省的实力有大有小（不少省同盟会的实力小于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参加起义队伍的更是鱼龙混杂，这就使各独立省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装夺取政权后，被立宪派、旧官僚采取阴谋手段，窃夺了实权（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宪派分子采取